

地区发展 与制度创新

首届江西发展论坛文集

DIQU FAZHAN YU ZHIDU CHUANGXIN
SHOUJIE JIANGXI FAZHAN LUNTAN WENJI

罗来武 汪德和 /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地区发展与制度创新

——首届江西发展论坛文集

主 编：罗来武 汪德和

经济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 萍 于海汛

责任校对：杨 海

版式设计：周国强

技术编辑：邱 天

地区发展与制度创新

——首届江西发展论坛文集

主 编：罗来武 汪德和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辑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富达印刷厂印刷

德利装订厂装订

880×1230 32 开 10.5 印张 260000 字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 7-5058-4504-7/F·3776 定价：20.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 编：罗来武 汪德和

本书作者与编委：

赵人伟	张宇燕	解思忠	张 军	罗来武
郑海航	党国英	韦 森	易宪容	曾康霖
李凤圣	张亦春	肖金成	余 晖	傅修延
张旭昆	李海舰	汪德和	赖德胜	徐 毅
肖四如	李建德	李绍光	孙耀唯	郑红亮
陈劲松	龚绍林	黄如金	胡援成	

前言

本书是2003年11月8日由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承办的以“地区发展与制度创新”为主题的首届“江西发展论坛”的论文集。文集上的论文大部分是专门为“江西发展论坛”准备的，对江西具有很强的实际指导意义。我们思考再三，最终决定交由出版社出版，希望对江西的实际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本次论坛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孟建柱、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吴新雄、副省长赵智勇亲临会场，孟建柱书记做了题为“地区合作与制度创新”的主题演讲。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进一步增强了学者们讨论江西发展问题的热情，在为期一天半的论坛中，先后有二十七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了专题报告，就江西经济发展中的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还有一些学者做了书面发言。会议委托李建德教授做了学术综述，通过学术综述，读者可以充分认识到学者们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江西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他们所提出的对策性研究，对江西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此，对所有关心这次论坛的领导，尤其是省委书记孟建柱，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他们如此关心学术问题和关心学者的行为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对所有来参加江西发展论坛的专家及他们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们期望，下一期“江西发展论坛”，能够讨论更深的问题，并出版更有实际意义的学术成果。

十分感谢经济科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尤其感谢责任编辑吕萍对本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她们的辛苦劳动，使本书得以尽快面世。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全体老师，特别是郑小萍、祝小霞、李霞等人，学科建设处的吴永明、杨颖等人为本次论坛做了大量的工作，李霞又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罗来武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代 序

首届江西发展论坛学术综述

李 建 德

2003年11月8日,由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承办的首届“江西发展论坛”在我校瑶湖校区隆重开幕,来自全国的30多位经济学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为我省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省委书记孟建柱出席论坛并做题为“地区合作与经济发展”的主题发言,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吴新雄出席,副省长赵智勇致辞。

本次论坛围绕“地区发展与制度创新”这一主题,结合江西省情,针对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振兴江西经济、推动制度创新为目的,以“三大突破、三大发展”为指引,论坛涉及区域经济发展、地区竞争优势、制度创新、对外开放、产业转移、城镇化建设、农业产业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方面,为探寻江西经济发展的新路提供了具有长远战略指导意义和现实实用价值的科学建议。论题主要集中在政府的发展和基本思路、政府行为和政府职能的转换、金融改革与发展和农业经济发展四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关于政府的发展和基本思路,这是本次论坛中相当集中的一个主题。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邹东涛研究员在题为《改革20多年来的经济总结》的报告中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具有这样的特性:积极的政治改革是保守的,而积极的经济改革是激进的,这个概括我觉得有他独到的地方。他指出这样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改革惟一成功的一

次。他对改革成功的解释用了一个很风趣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做中国猫捉中国老鼠，同时他希望我们江西人，我们江西的政府，我们江西的学者要做江西的猫，捉江西的老鼠。我认为这是我们知识经济学近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重视本地知识。只有把握了本地知识，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才有可能成功。

2.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司长、博士生导师肖金成教授做了一个《体制改革与区域经济发展》即席的讲话，对我们江西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四个重要的指导建议（关于江西经济发展的想法）：一是我们有 20 年的江西发展的机遇，我们必须好好把握住这个机遇。二是江西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区，我们的行政区划要按照经济发展的自身的要求进行比较大的调整。三是他建议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城市体系，我们江西现在的城市体系结构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需要的，没有一个地级市超过 50 万人。四是用一句话但是含义深刻地概括了经济要以环境的改善为基础。这四点建议对我们江西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3. 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解国忠先生在《人的素质与地区发展》这样的一篇报告中指出，“后发型”国家的现代化应该首先致力于人的现代化。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于说，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并对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4. 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处长、出版社社长、博士生导师赖德胜教授在他的《人类资本制度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提出，以深圳这样的地方，能够在短期内接收大量的人力资本为例子证明，我们最重要的要得利于人力资本的制度安排，这个制度的安排必须是合理的，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他还具体分析了人力资本的供给制度、配置制度和回报制度，讨论我们应该如何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工业经济》杂志主编李海舰博士在题为《江西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重大外部环境分析》的报告中，围绕区域产业转移、脑体分离发展、

制造范式革命和企业范式革命，提出江西经济发展必须将自身发展全面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之中，与时俱进，与世俱进。报告首先介绍了国际产业转移和国内产业转移的历程和特点。其次，分析了脑体产业的分离与再分离、脑体产业分离发展的地域特征，以及脑体产业分离发展对江西的启示。认为脑体产业分离发展为江西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再次，制造范式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具体体现在向专业化、网络化、集群化、高级化、服务化、智能化、信息化、虚拟化、敏捷化、绿色化发展。最后，分析指出了企业范式革命拥有先进的核心能力，这是现代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秘密所在。以核心能力为主线，打造 21 世纪的新型战略管理模式，这是领航企业面临的重大任务。并指出企业核心能力必须由显性知识上升为隐性知识，企业竞争主要靠的是异质型资源。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江西籍学者余晖研究员做了题为《温州模式的社会生产体系新解及对江西的启示》的报告。首先对目前关于温州模式的文献简要地做了一个综述；其次介绍了社会生产体系的理论；第三，用这个体系来描述了温州的生产方式并对温州模式进行了新的解释；第四，解释了为什么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生产体系只在温州出现并取得了成功；最后阐发了温州模式的意义。这个报告是比较新颖，比较前沿的学术成果，他把温州的很多闪亮之点，用珍珠这个词来涵盖，他说市场的发育——产业的集群——民间集资的城市化——民间金融——行业协会，这一颗一颗闪亮的珍珠，他用社会生产体系这根金线把它们完整地串联起来，由此他指出社会的生产体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福特型的；另一种是集群型的。温州模式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它的解释，温州模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 20 多年来，落后地区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漂亮模本。我觉得这个模本可能对中国下一步的社会经济治理，包括宪政体制的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体制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7.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博士所提供的《文化精神、制度

变迁与经济发展》这篇报告，通过比较印度经济与中国经济，认为对经济增长而言，制度是重要的，但可能不是决定性的。制度本身往往是在一个社会、地区或社群的既存文化传统中现实秩序与规则的整合。探讨了商业精神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文化与市场秩序，进而与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快慢与否的一个更为直接的作用链条，可能是通过商业精神来传递的。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经济体、一个地区来说，商业精神尤为重要。经济本身是交易出来的，而不是生产出来的，更不是命令出来的，当然也不是什么“制度创新”出来的。经济的增长，是市场扩展的一个结果。而市场中的制度规则和结构，尽管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可忽视的激励和规范作用，但它们也是市场自发扩展和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内生结果，而不是相反。提出制度与市场，绝非应是“无马先置鞍”的情形，而应该是且必定是“有马再配鞍”的关系。

8.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傅修延博士的报告题目是《弘扬井冈山精神，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氛围》。他非常生动地用文化学者和丰富的历史资料谈到了我们井冈山文化和江西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井冈山精神依然是促进我们事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他认为井冈山精神中有这三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敢为天下先的胆魄；二是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震海而不能惊的坚忍；三是处重围而不乱、置死地而后生的从容。江西目前正在向浙江等先进邻省学习，引进别人的一些先进观念和做法，这些将对本省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只有学习型的社会才有前途，只有通过学习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学浙江不能沦为空泛的口号，要想真正学有所得，就得无情地将己之所短与人之所长相比较。弘扬井冈山精神，为的是兴我美好江西。今天赣江两岸正在涌动一股“爱我江西、兴我江西”的热潮，全体江西人都应该发扬这股精神，将江西的崛起当作自己的责任。当年井冈山人民坚信自己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今天的江西人也要坚信自己一定能开创出美好的未来。

9.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曾康霖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漫谈信用环境建设》，他分别从文化视角看待信用，指出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信用因子，是中国信用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思路。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看待信用，指出树立“信用财富”的现代信用理念，是中国信用环境建设的思想基础。从金融和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看待信用，指出政府和金融部门“无信则亡”的准确定位，是中国信用环境建设的组织保障。从制度安排特别是经济制度看待信用，指出加快产权制度改革，以明晰的产权来维系信用，是中国信用环境建设的制度前提。打造“信用江西”，是江西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一方面，政府自身要保持至高无上的信用度。另一方面，政府要着力推动信用环境建设。并就江西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一是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二是建立信用中介服务机构。三是注重信用管理的法规建设。四是培育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

10. 江西师范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李建德教授在题为《论中西部发展中的制度陷阱》的报告中讨论了制度经济学高度关注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或处于制度变迁中的经济发展问题。报告论及我国“西部大开发”中约束经济发展的一种情景，分析我国先发展地区与后发展地区之间决定公务员行为差异的制度环境的形成，进而分析这种环境对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如何形成了陷阱似的约束。最后，尝试分析走出制度陷阱的路径，并通过对这一现实问题的分析，对制度经济学的若干基本概念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提出要真正走出制度的陷阱的建议：一是要相对集中地发展。二是要形成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竞争。三是要深化改革，使正式制度发挥主导作用。四是要普及制度经济学的知识。

第二个问题是最集中的，我们的经济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关于政府行为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专家提出了非常多的意见和建议。

11.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绍光博士的《地方政府与社会保障》的

报告指出社会保障是一个重要的政府行为，目前重点仍然主要在养老保险方面，他认为养老保险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核心）是养老保险基金的欠债问题（这仅是国企职工的欠账）。我顺着李绍光先生的意见我要指出两点，希望地方政府能够高度重视：第一，我们原来的欠账是不由企业来欠账的，实际上欠账还在大规模地上升的是事业单位的职工的欠账，必须尽快地把这个切断，不能再继续扩大下去了，将来我们的政府是绝对还不起这么大一笔欠账的。所以事业单位的社保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第二，我希望通过李绍光先生带给中央政府的建议，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保险制度都是各个部门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一个对付具体问题的保险制度，而任何保险制度是惯性非常大的，做一个数量调整都可能要十几二十年，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需要有一个跨部门的超出局部问题的整体的一个构想。比如说城乡养老保险必须一体化，不然我们无法完成城市建设。现在我们农村改革，因为我这次在中央统战部的安排下和林毅夫教授一起在江苏考察，他们在搞农村社会保险的时候都说我们现在水平提高了，要向城市保险靠拢，我感觉到这是个误区。我们城市保险是不可能可持续发展的。相反，现在农村实施的倒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到底应该谁向谁靠拢这是一个值得重新考虑的问题。中央不在一个整体的基础上思考这个问题，而在具体实施一个一个片面的养老保险或是医疗保险，非常非常的危险（问题是严重的）。

12. 中银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先生的报告题为《基础事业的商业化与政府监督》（新公共管理的领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报告。他报告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政府要有选择地退出公共物品的直接供给。我们传统经济学中已经非常清楚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但是新公共管理经济学告诉我们，政府要努力地从直接供给退出，更多地转向政府采购。在转向政府采购的同时，政府要从管理型政府向监管型的政府转型。同时他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在这个领域中的创新，那就是公共民营合作制。这是我们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在新公共领域的一个很好的闪亮点。他对此做了很多具体

的介绍。那么对我们的政府要从管理型的政府转向监管型的政府，我们应该具体地怎么做呢？他提供了在监管定价制度上的很多素材，谢谢他提供给我们两个软盘，供我们政府从中取得些理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经济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宇燕先生的《美国政府管制与经验启示》，用十分生动和具体的事例为支撑，证明了即使像美国这样的主张个人主义的国家，实际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他给了我们四个重要的建议：一是根本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没有政府管制根本无从谈起（也就没有）市场；二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的有效管制；三是放松和取消管制（实质是有效地实施管制，而不是取消）不是我们过去的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不要管制和取消管制，而仅仅是提高管制的效率；四是有效性的条件之一是与时俱进。所以我们过去都说要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我认为这样的提法可能是一个误导，政府不是“大”“小”问题，而是“有效”。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民众所需要的公共物品是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公共物品，政府就可以有大小的不同。从效率来讲，抽象地去分析，无非是政府所提供公共物品的边际效应等于个人物品的边际效应，那么整个社会就最有效。简单地说什么大什么小是一种误区。

14. 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郑海航教授在题为《企业家的成长与江西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提出了保护企业家，企业家是创新，是资源配置家。通过对中国企业家百年沉浮的启示和过渡期的“半企业家”及其特征的分析，指出一个成熟的企业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应包括具有敢冒风险的能力；在特定领域能将深厚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的管理知识结合起来；具有创新能力；远见卓识，具有战略性眼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企业家成长的环境对企业家能否成长和大批涌现经常起的是决定性作用。企业家环境可以概括为三大环境：宏观环境、微观环境和文化环境。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特别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和市场环境的竞争性程度，这是决定企业家成长的关键变量。企业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企

业家的成败。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它既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习惯密切相关，又受该地区、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刻影响。政府应该建立一个适合企业家发展的大环境，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15.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旭昆博士关于《民间自发的制度演化与政府主持的制度演化》的报告指出，在民间自发的制度演化与政府主持的制度演化之间是一个连续光谱，其中包括纯粹民间自发的制度演化，政府疏忽条件下民间自发的制度演化，政府无为而治条件下民间自发的制度演化，政府倡导或主导的条件下由政府 and 民间合力推进的制度演化和完全或基本上由政府设计并推行的制度演化。政府主持的制度演化又可以区分为中央政府集权推进和地方政府分权实施两个大类。他的主旨非常清楚，就是制度演化过程中要解决好民间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他对江西经济发展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一是政府要尊重民间的“非制度行为”，实际上就是不合现有制度规范的行为。二是要保护企业家。因为商业精神对我们区域的发展是关键的关键。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赵人伟研究员在题为《从浙江经验看省域经济转型》的报告中指出，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一个历史时期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通过对浙江经验的分析和总结，从体制转型的方面分析了浙江的体制变迁的程度或深度、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体制变迁中市场主体的构造和市场体系的发育以及体制变迁中的创新动力；从发展转型及其同体制转型的关系方面总结了浙江的发展程度的估计或判断、经济增长周期同宏观经济环境、经济发展的进程和经济结构的转换、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演进以及发展轨迹和制度变迁。他提出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双重过程。他也同样指出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民众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民众的诱致性体制变迁与政府推动的强制性体制变迁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

17.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张军教授给我们提供的报告是《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的视野》。他的结论：一是发展的目标是人民的富裕而不仅仅是人均 GDP 的增长；二是人均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三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投资的合理性和效率；四是投资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是企业家自己的行为；五是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就是加速资本的形成；六是在一个经济需要起飞的时期，政府需要可信的承诺来支持和保障企业家的产权。尤其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在发展初期的作用至关重要。通过这么一个逻辑的循环他认为政府的最重要的行为就是鼓励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从而保证加速资本的形成。因此，他认为政府在经济需要发展的时刻提供可信的承诺，来支持和保障企业家的产权。

18.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张曙光研究员的报告主题是《使用权的独立与保护和经济发展》。他用大量事例说明了政府提出保护产权是一个进步，但还不够，不能单说保护产权，也不能只强调保护所有权，更不能以保护所有权为名来剥夺使用权。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如何保护产权和保护什么产权的问题。他将指导保护产权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深刻的层次。指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修宪建议中，包括了“所有合法财产都受法律保护”的内容，从而将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纳入到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之中，这确是一大进步，不过，没有写上人们期待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字句。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中，不仅确立了使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化、法制化、稳定化的目标，而且提出了“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力求“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是对传统公有制观念的重大突破。决议的制定是为了指导行动，是要贯彻和执行的。每一个贯彻落实的行动比一百个宣言都重要，也是对决议的真正拥护和坚持。

19.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罗来武博士的报告题为《从博弈和知识角度看投资环境建设》。他认为我们区域经济的范式到了现在

已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区域竞争的范式发生了改变，规范的竞争手段只有有益于边际收益递增；投资环境的改善成为地区竞争的核心能力。投资环境构成了企业的外部经济。制度决定了愿意不愿意改善制度环境，而能不能改善是由知识决定的。为了在现有条件下改善投资环境，应以集中式发展，以增量改革、超越式学习浙江经验，强制制度变迁。在这个阶段，规范的竞争方式能够取得边际收益递增，而原来规范的竞争方式是成本很高而收益很低的，这在新的历史阶段做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对此我们要有一个充分的估计。因此，他提出投资环境对企业的外部环境构成了一个关键的理由，这是他对投资环境的定义，就是一个外部经济。他进一步地分析，区分了两个问题，制度决定了愿意不愿意改善制度环境，而能不能改善是由知识决定的。因此他分析了如何改变引导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他也提出了怎么使大家能够有利学习制度环境的改善。

20. 江西省新余市市长汪德和先生的《经营城市与城市经营》的主题报告认为经营城市就是对构成城市空间资源、功能载体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及其相关延伸资本，进行集聚、重组与运营，从而实现资产价值的行为和过程。首先从关于经营城市的目的、对象和主体入手，然后分析了经营城市的要点和思路，指出经营城市的首要环节是城市定位；核心是提升城市的产业竞争能力；重点是建立有效的市场运作平台；关键是因类制宜确定适宜的投资主体和经营模式。其次讨论了城市经营的手段和操作路径，针对利用城市规划、土地经营、城市其他资源、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政策、多方筹措资金的经营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总结了经营城市的重要意义。通过对城市资产进行有效的经营，既解决了长期以来制约城市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又为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重点陈述了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和如何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21. 江西省政府副秘书长肖四如先生在《政府理财的新观念》中提出了政府理财的目的是实现资源配置最大限度的优化，即大理财观念和动态理财观念。政府要用市场经济办法运作好当期资本。具

体包括经营土地资本、以政府收费权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权吸引社会资金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增加投入中的杠杆作用。要实现政府资源的动态、长期优化。政府就要善于借助市场经济的手段，善于运用金融市场工具来增强自身的调控能力和建设能力，从计划分配资源和财政收入的传统思维中走出来；要建立功能型政府的新观念，政府从实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城市化水平和农村现代化水平，实现人民福祉和维护稳定等功能出发，大胆借助市场手段来达到目的；政府要从当前收支平衡的会计型的理财，到长期动态平衡的经济型理财转变，善于把未来的现金流变成当期的巨大建设投入；从过去仅仅着眼于运用财政资本到充分运用、科学配置所有的政府资源（各种收费权、资产收益权、特许经营权和公益性有偿投入项目收益权等），把资源变成资产，把资产变成投入。

22. 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副司长耀唯博士在题为《电力改革和地方经济发展》的报告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应该如何对待的问题。我们过去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垄断是越来越多的，而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恰恰是自然垄断越来越少了。不仅自然垄断越来越少了，而且我们对于自然垄断还可以分解。分解成更小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的直接管理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管理型的政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而要把规则型的政府提高到更高的地位上来。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郑红亮先生的报告《要素流动、制度创新与地区经济发展》针对如何抑制住我国地区之间，主要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提出要以市场化竞争为基础，通过制度创新促进要素流动，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逐步地缩小这种差距，达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目的；任何违背市场原则的人为的行政干预措施都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并从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有一个从效益低的地方往效益高的地方流动的规律，就像俗语所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不以人的意志